

## 組建保衛中國同盟，爭取國際援助

### 一、「保盟」的建立

日本侵略軍攻佔廣州後，封鎖了中國東部海岸線，但是它暫時還不敢向歐美國家發難。因此，香港這個由英國殖民者統治的自由港，一時幾乎成了中國抗戰事業與海外聯繫的唯一通道，也成為那些熱心於抗戰並對蔣介石獨裁統治不滿的政黨團體和愛國民主人士進行抗日活動的重要據點。何香凝、柳亞子等數百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先後來到這裡，香港一時成為風雲際會、冠蓋雲集之地。同時，大批難民（包括不放心在內地投資的富有者），也一批批來到香港。港英當局出於英國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對於這些人的抗日活動並不干涉，甚至還給予同情和支持。所有這些，都使香港成為宋慶齡在新的條件下，發揮自己特殊才能為抗戰服務最理想的「用武之地」。她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呼籲國際援助中國抗戰上，決定利用自己獨特的政治地位和和在國際上的崇高威望，在中國抗戰與國際友人、海外華僑之間搭起一座橋樑，使二者團結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一場戰線廣闊的較量。

從抗戰爆發到一九三八年六月，宋慶齡先後多次向英、美等各國政府和人民寫信或發表廣

播演說。她的呼籲首先得到一些國家進步團體和友好人士的回應。白求恩大夫帶領的醫療隊，受加拿大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來到香港，與宋慶齡接洽後，就由她介紹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然後去延安，分配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工作。接著，又有一些外國醫療隊和華僑組織的各種抗日團體和志願人員來華，並有各種捐款和物資陸續到來。但是不久，援助工作中開始暴露出問題來，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缺乏事實進行宣傳，所以，外國朋友所得到的關於遠東的真實情況極不充分，影響他們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援；二是在分發捐款及物資時，缺乏聯繫及監督，因此，分配時，「既未能根據最急需的需要，又未能按照捐獻人的意見做到合理」。<sup>39</sup>這兩個缺點主要是由於國民黨政府腐敗機構經營著接待外援工作造成的。中國共產黨曾試圖改變這種狀況，在白求恩路過香港時，中共駐港辦事處廖承志、廖夢醒、鄧文釗等曾組織一個加拿大醫療小組，但工作很難開展。他們同宋慶齡商量，而宋慶齡也正準備籌組一個機構，以克服以上兩個缺點，獨立公正地進行爭取外援的工作。

當時要成立這樣的機構，非宋慶齡莫屬。只有她出面，才能得到國內外有聲望有權勢的著名人士的回應，從而才能衝破國民黨政府對募捐工作的壟斷。因為國民黨搞了一整套官辦的「抗敵後援會」，以統一切募捐活動，並通過其特務系統，控制南洋各地華僑愛國捐獻團體，通過外交部門控制各國的捐助，企圖使所有支援中抗戰的錢物都落到蔣介石官僚集團的

腰包裡。

宋慶齡對國民黨政府的壟斷提出了挑戰，而香港的客觀條件也有利於她開展這個工作。於是，她廣泛聯絡國內外著名人士，終於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邀請諸如賈·尼赫魯、保·羅伯遜、湯瑪斯·曼、克雷爾·布希、賽珍珠，以及馮玉祥、孫科等人，在香港共同發起建立了「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他們都擔任了「保盟」的中央執行委員，宋慶齡任主席，宋子文任會長，克拉克任名譽秘書，司庫是鄧文釗，名譽司庫法朗士，愛潑斯坦任宣傳委員，秘書有廖夢醒（兼辦公所主任）、希爾達·司徒



一九三八年，宋慶齡和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合影於香港。自右至左：廖承志、法朗斯、克拉克、宋慶齡、廖夢醒、鄧文釗、愛潑斯坦。

永覺夫人和王安娜等。後來，鄒韜奮、金仲華、陳君葆、許舜英、許乃波等，都參加了「保盟」的工作。

「保盟」開始沒有辦公室，就在宋慶齡家中開會和辦公。後來，在西摩道二十一號建立會址。雖然離九龍宋慶齡的寓所較遠，但她經常出席會議，過問會務。「保盟」例會一月一次，都由宋慶齡親自主持。她主持會議，作風民主，「從不作講演，只是設法讓每個人——委員或工作人員都出席並發表意見」，然後提出自己的主張與大家商量。她「總是用平穩的語調表示自己的看法，但這些文靜的話語卻具有很大的說服力——雄辯、清晰和講求實際」。她反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做出決定後，她就「建議採取具體行動，並提出具體時間」。<sup>40</sup>開會時因有國際友人，她一般講英語。「一口流利的英語，連外國朋友也感到『無懈可擊』。她平時講上海話，普通話少說，偶然也講幾句廣東話，帶點中山（縣）口音。她對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態度十分和藹、親切，使人有如沐春風的感受。」看門的女工人背後稱她為「玉觀音」。<sup>41</sup>

宋慶齡做工作歷來講究效率和速度，因此往往廢寢忘食，有一種拼搏精神和犧牲精神。「保盟」通訊員潘標後來回憶說：宋慶齡「心裡除了工作就是別人，唯獨沒有自己」。她在保

40 愛潑斯坦：《我所瞭解的宋慶齡》，載《人物》一九八〇年第三期。陳君葆：《宋慶齡抗戰時在港數事》（鐘明記述），載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

41 徐舜英（保盟工作人員）：《我們時代的一顆巨星——憶宋慶齡居留港滬對》，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二百一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盟的工作，「沒有上班、下班的區別，更沒有星期日的概念……有時會在天色未明的清晨就來到西摩道二十一號，匆匆忙忙地開始一天的工作，也有時在午夜的鐘聲打過很久還沒有回去」。潘標還講了這樣一件事：「在一個寒風刺骨的冬夜，大約二時左右，我聽到門外的鈴聲急促地響了。我連忙按亮電燈，打開大門。門外站著一位身穿大衣的女士，正是尊敬的孫夫人。她匆匆走進門來，從辦公室取出一些文件，又匆匆地離去了。臨出大門，她向我笑了笑，講：『亞標，謝謝你，吵你休息了。』我當時感動得講不出話來。」<sup>42</sup>

宋慶齡的生活非常節儉。她的住房不大，客廳很小，牆上掛著孫中山親筆寫的對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還有一幅約二尺闊的中山故居的油畫，大門外矗立兩棵桃榔，象徵萬古長青。酷暑季節，她的餐廳裡連個電風扇也沒有。宋慶齡的菜金每天只有二角銀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她還醃了一罐鹹蘿蔔，準備過最艱苦的日子。<sup>43</sup>

從抗戰爆發後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兩年，香港隨著高級難民的增加，各式各樣的私人車擠滿了道路。朋友們屢次主張給宋慶齡購置一部汽車，都被她拒絕了。因此，她出門既沒有私人汽車，也沒有隨身侍衛。這不是因為沒有錢去購車、請人，而是體現了宋慶齡一再強調並且身體力行的原則：「把每一枚銅元用到祖國的抗日戰爭中去！」她把所有的錢都拿出

42 參見潘標回憶、桑擘整理：《憶宋慶齡女士在香港》，載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四月九日。

43 參見根塞：《亞洲內幕》第兩百八十二頁，重慶時與潮社一九四一年版。潘標回憶、桑擘整理：《宋慶齡女士在香港》，載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

來捐贈給救濟事業了。她衣著樸素：夏天穿四川產的麻織的衣服或黑膠綢長衫；冬天則穿長旗袍和大衣。她安步當車，如浴清風。

所有這些，與當時許多國民黨軍政官員（包括她的姐妹兄弟在內）大發國難財、侵吞國內外救濟財物的景象，形成鮮明的對比，更加顯得她的人格無比高尚。人們把她比作深谷幽蘭，是人民在苦難中「力量和精神延續的源泉」。<sup>44</sup>

宋慶齡不僅自己克己奉公，而且不許別人假公濟私，利用他和「保盟」的關係謀取私利。曾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後害怕掉腦袋而退出去美國的林語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期返國途中經過香港。他要求會見宋慶齡，宣稱自己回國是要和「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同甘共苦，直到戰爭結束。可是當宋慶齡建議他用寫作支持「保盟」工作時，他沒有任何反應。原來，他真正感興趣的是下次救濟物資何時從美國啟運來華，因為他想把他在美國買的一輛昂貴的汽車，作為救濟物資之一運來重慶，以逃避關稅和其他一些麻煩的手續。當宋慶齡問他是否願意把他那輛汽車裝運醫藥物資時，林語堂經過一番痛苦的、慎重的考慮，回答說，不願意，除非能保證汽車的新靠墊不被弄髒、弄壞。林語堂錯誤地把「保盟」看成是國民黨的一個「救濟」機構了，以為只要一旦和這個機構的領導人建立適當的聯繫，就可以「要什麼，有什麼」。林語堂遭到宋慶齡客氣但是堅定的拒絕，只好悻悻然告辭而去。應宋慶齡之邀參加這次會見

的愛潑斯坦在一九八〇年回憶說：「至今我仍能想起宋慶齡目送他離去的背影時流露出的嘲諷的神色。」<sup>45</sup>

「保盟」成立後，就在上海、廣州等地建立分會。許多當地的中外著名人士參加分會組織。

香港總部中最積極的是與宋慶齡友誼很深的醫療服務中心主任希爾達夫人，她既是一「保盟」總會的秘書，又是「援助中國紅十字會」這一外國人組織的秘書。與香港上層那些死氣沉沉、貪慕虛榮的人不一樣，希爾達夫人積極、充滿活力，「有敏捷的組織能力，又能集中精力去做目前急需的事情」，而且實際工作不委諸他人，而是親自用電話與人商談，或四處奔走。她參加各種中國人團體的活動，並和她的丈夫合力推行一系列「激進的」改革。夫婦兩人堅決反對種族歧視，不斷為中國人享有平等權利而努力，並且促使香港總督羅國富和主教羅倫德·O·霍爾博士支持宋慶齡的「保盟」。<sup>46</sup>

「保盟」上海分會的秘書是耿麗淑。她於一九二六年三十歲時作為美國全國女青年會的工作成員來到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史沫特萊、斯諾、路易·艾黎等經常在她的住處聚會，交談他們對蘇區的見聞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這些談話使她認識了中國的現狀及其出路，並對宋慶齡產生了崇敬的心情。抗日戰爭爆發後，她目睹日軍踐踏上海的情景，毅然加入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行列，接受宋慶齡委託擔任上海分會秘書。她主要的任務是把

45 愛潑斯坦：《我所瞭解的宋慶齡》。

46 參見《聯邦德國》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頁，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版。

日軍侵略，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和新四軍抗日鬥爭的事蹟報告給在香港的宋慶齡，並遞送新四軍與宋慶齡的聯絡信件。在上海淪為「孤島」的時期，通過郵局寄出的信件都得經過檢查，更不用說是寄給宋慶齡的了。為了衝破敵人的封鎖，耿麗淑想方設法逃避檢查。那時每週都有一艘美國「總統」號客輪在上海停靠，然後駛往香港。耿麗淑每次瞭解到客輪停靠的時間，便喬裝上船，將信件投入客輪的郵筒。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她還多次冒著生命危險，把「保盟」的物資秘密地運送到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去。<sup>47</sup>因為當時分工是，由香港分會負責支援八路軍，上海分會支援新四軍。一九四〇年，她返美途經香港，宋慶齡在「保盟」總部同她會見，並委派她以「保盟」秘書身分去美活動，繼續宣傳解放區的抗日事蹟，並為解放區募集捐款和物資。一九四六年她重返上海，擔任繼「保盟」後組織的中國福利會秘書，為中國革命再做貢獻。

上海分會的另一名骨幹吳大琨，是救國會的成員。沈鈞儒等「七君子」獲釋後，救國會就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上海失守後撤到武漢。吳大琨在一次車禍中，被撞斷右臂骨，決定回上海「孤島」他母親處療養。途經香港時，宋慶齡邀他到寓所吃飯，席間，發展他加入了「保盟」。她對吳大琨說：「現在我們要動員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來支援我們神聖的民族戰爭，爭取一切國際援助。我發起成立了『保衛中國同盟』來做這方面的工作。我想你一定是願意參



加的。」吳大琨被分配到上海分會工作，與耿麗淑聯繫。一九三九年春，吳大琨代表上海各界人民去皖南新四軍軍部進行慰問，帶去上海分會募捐的各種醫療物資。當慰問後回到國統區時，他遭到國民黨特務非法綁架，關進上饒集中營。後經宋慶齡多次營救，才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交保釋放。<sup>48</sup>

廣州分會是宋慶齡親自委託愛潑斯坦建立起來的，而這是他們兩人為中國革命友好合作的開始。愛潑斯坦的童年是在天津度過的，那時他從父母親和長輩們的談話中，早已仰慕宋慶齡的大名。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愛潑斯坦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閱覽了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期間的一些生動的關於革命的報導，其中有美國的文森特·希恩所撰寫的《個人的經歷》。這本著作對宋慶齡和她所起的作用，深表欽佩和讚賞，給愛潑斯坦很大的影響。此外，他又通過宋慶齡自己發表的言論來認識她。愛潑斯坦回憶說：「當我在天



一九三八年，宋慶齡在廣州視察傷兵醫院。

津的英語日報工作的時候，我們常常收到一些簽有她的名字的聲明和呼籲書。這些材料經常是裝在沒有注明覆信地址的信封裡寄來的，或者是些字跡不清晰的複寫副本。有些是她獨自一人發表的，有些則和別人一起聯名發表。有些聲明或呼籲非常激動人心。」<sup>49</sup>這些聲明和呼籲書有斥責國民黨暗殺楊杏佛罪行的，有在一九三三年遠東反戰大會上的演說，以及為營救「七君子」的聲明等。後來，「我在北京期間，她所寫的文章，有些是交由埃德加·斯諾轉給我的，有些則是由埃德加·斯諾通知我，要我注意的」。

愛潑斯坦的這些回憶，不僅生動地講述了他在認識宋慶齡前對她尊敬感情的由來，而且說明在宋慶齡受到白色恐怖嚴密監視的日子裡，她的聲音是怎樣傳播到全世界的。



《中國呼聲》是美國友好人士格蘭尼奇於一九三五年在中國創刊的。它主要是對全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介紹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戰績。宋慶齡是這份刊物的支持者和撰稿人。這是《中國呼聲》最後一期的清樣。由於日本軍隊的轟炸以及香港淪陷，使在香港出版的這一期刊物來不及付印被迫停刊。

一九三八年九月，愛潑斯坦作為美國合眾社記者來到廣州。宋慶齡通過格蘭尼奇的《中國呼聲》瞭解到他的一些情況後（他曾給該刊寫過稿），便邀請他參加了「保盟」，並委託他在嶺南大學任教的美國教師及其他外國僑民、留學生等，發起組織廣州分會。

廣州失守以後，愛潑斯坦離開合眾社，到香港擔任「保盟」的英語宣傳工作，主要是編輯「保盟」的機關刊物《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簡稱《新聞通訊》）。開始一段時期，編輯和油印工作，都是在宋慶齡家中進行的。從此，她在宋慶齡的領導下工作一直到她逝世，長達四十三年之久。而且，愛潑斯坦還為中國人民的建設事業，一直奮鬥到二〇〇五年逝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 二、「幫助中國就是幫助你們自己」

「保盟」成立時，宋慶齡（主席）、宋子文（會長）、克拉克（秘書）、法朗士（司庫）和艾培（宣傳）署名發表《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宣言》，明確聲明「保盟」目標有二：（一）在現階段抗日戰爭中，鼓勵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進一步努力以醫藥、救濟物資供應中國；（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強此種努力所獲得的效果。

根據這樣的目標，宋慶齡領導「保盟」大力開展宣傳工作，向國際社會及海外華僑介紹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意義及困難，呼籲支援；並使他們瞭解應該怎樣援助中國最需要的方面。

為此，在宋慶齡的關懷和愛潑斯坦的支持下，「保盟」從成立到一九四〇年初，就在極端

困難的條件下，出版發行了二十餘種宣傳品，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保盟」中央機關刊物《新聞通訊》。該刊初期只是油印，後經宋慶齡等人的努力，得到香港《南華早報》社支持，從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起，編輯發行了新刊鉛印《新聞通訊》，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軍佔領香港止，共出了三十六期。

《新聞通訊》除了發表宋慶齡的一系列致國際友人及華僑的函電和文章外，主要刊登國際友人在中國工作或採訪時，應宋慶齡之約而寫的反映八路軍、新四軍及國民黨軍隊抗日的戰地報告及評論文章。因此，該刊具有舉世公認的客觀性、真實性和可信性（尤其對於外國讀者來說）。再加上它文風短小精悍、生動活潑、新鮮及時，所以贏得海內外讀者的歡迎。

「保盟」還出版了不少工作報告和各種小冊子。一年一度的工作報告是由宋慶齡親自撰寫的。這些宣傳品廣泛發行到歐、美、東南亞各國，遍及五大洲，對聯絡國際，溝通資訊，說明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及時瞭解中國抗戰真相和需要，動員他們以捐款及最急需的物資支援



一九三九年在香港。

中國抗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這方面，宋慶齡利用自己掌握的豐富材料和真知灼見，親自撰寫文章和同盟的工作報告，發表對外廣播演說和信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這些函電、檔中，她在對外介紹中國抗戰真實情況時，反覆闡明兩個問題：

(一) 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地位。

宋慶齡之所以成為一個非凡的人物，在於她觀察政治問題始終具有其提倡的「世界眼光」。根據自己長期從事中國革命、世界和平和反帝反法西斯鬥爭的經驗，她認為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以及他們血腥和非人道的破壞行為不僅威脅著中國的獨立，而且也威脅著所有民主國家，威脅著人類的和平與自由。因此，「中國不僅是為了它自己而戰鬥，並且也為了全人類而戰鬥」；「中國正在進行一個對於全世界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鬥爭」。<sup>50</sup> 就是說，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僅是爭取國家生存、民族解放的戰爭；而且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國際暴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黑暗反動、保存民主、爭取人民權利的戰爭。

宋慶齡還縱觀全域，尖銳地指出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中的重要地位。她說：中國的抗日戰場，「是反法西斯鬥爭的關鍵性的地區」，甚至「是有決定性的一個地區」，並明確指出：「一個自由中國是遠東和平的唯一保障，一個自由中國將是全世界向和平與自由邁

50 宋慶齡：《致英國工黨來華調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團的信》，載《宋慶齡選集》第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進的第一和重大的步驟。」<sup>51</sup>

事實勝於雄辯，隨著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發展，越來越清楚地證明宋慶齡的上述論斷是無比正確的。

一九四一年十月，宋慶齡在為紐約《亞細亞》雜誌寫的文章中對美國人民說：「中國的戰爭是遠東局勢的關鍵，並且不僅限於遠東。我們的繼續抗戰保障了太平洋兩岸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未來。它的國際的重要性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估計出來：它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屬地，在北方不能進攻蘇聯。」

宋慶齡還拿英美帝國主義開始推行的對法西斯主義綏靖政策來對比，強調中國抗戰對世界進步的貢獻，指出：「正是由於中國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樣地拒絕投降。因此，連慕尼黑協定也沒有能夠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沒世界。」<sup>52</sup>

令人欽佩的是，宋慶齡早在一九四一年元旦就提醒世界注意日本在太平洋的軍事行動。一九四〇年九月，日德意簽訂了軍事同盟條約，三國互相承認彼此在歐洲、亞洲的霸權地位。一九四一年元旦，宋慶齡主持撰寫的「保盟」中央新年致國際友人書中，針對這種形勢，尖銳地指出：日本的行動是與軸心國協調一致的，它正在「把它的軍事力量向南推進到太平洋」，因此，「目前的局勢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嚴重。在遠東，一九四一年將是關鍵的一年，

51 宋慶齡：《給外國機構的一封信》，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十三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52 宋慶齡：《給全世界的朋友的信》，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七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甚至是最關鍵的一年」。

這個預見和警告，曾隨著這封信廣泛投寄到國外各團體和知名人士手中。遺憾的是並沒有引起後來成為同盟國的幾大領袖的注意，仍對德、義、日法西斯姑息遷就，以致招來珍珠港和敦克爾克之辱，給世界人民造成極大的災難，這個歷史教訓是很深刻的。

## （二）援助中國與保衛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關係。

中國抗戰既然也是在為世界人民而戰，那麼，中國人民就有得到世界人民支援的權利。世界人民幫助中國，也就是幫助他們自己；中國人民不僅接受幫助，也幫助提供幫助的國家和人民。所以，宋慶齡在給海外朋友公開信中指出，「保盟」的口號是：「幫助中國人民，使他們能幫助他們自己——並幫助你們。」<sup>53</sup>

宋慶齡的這個思想也是十分透徹的。為了說明這一點，她擺事實，講道理，剝削剖陳利害，指出中國抗戰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休戚相關的。

早在參加保衛上海的戰鬥時，宋慶齡在給英國工黨及其政府的幾封信中，曾列舉日本進攻上海時嚴重損害英國在華利益的許多事實，說明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不僅威脅著中國的獨立，而且也威脅著所有民主國家，威脅著人類的和平與自由」。<sup>54</sup>後來，她又對香港的中西人士說：「……我們看到每次日本在中國獲得軍事上的勝利，它就加緊進攻太平洋

53 宋慶齡：《給中國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載《宋慶齡選集》第一百七十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54 《抗戰聯合旬刊》第四期，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

的英國和美國的據點。如果中國投降，如果中國不戰而淪為日本法西斯軍事機構的一個物資供應基地和人力補充站，那麼，請想一想，我們還能夠在香港安靜地坐在這裡嗎？」<sup>55</sup>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宋慶齡在《抗戰以後的中國——抗戰二周年紀念告美國友人》一文中，批評當時英、美國家正在搞的遠東慕尼黑陰謀時，尖銳地指出：這個活動不僅對我們中國抗戰不利，同時也是「犧牲民主國家在華利益的愚笨行為」。<sup>56</sup>

宋慶齡在抗戰時期的許多文章、演說和信件中，強調保護歐美國家在華利益問題，以促使他們關心和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這當然不是要中國人民「依賴」歐美帝國主義，而是利用矛盾，首先集中力量組成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以打擊當前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同時，宋慶齡的主要目光，在於通過政府，來爭取這些國家的人民對中國人民真誠的援助，加深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戰鬥友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她在《致美國工人們》的信中，曾明確地指出：「今天，盟國的力量與中國自己的力量正在中國的土地上打擊日本。中國戰鬥得越有力量，對日戰爭就越會縮短，美國人民生命的損失就越會減少。所以中國抗戰與美國工人利益休戚攸關。」<sup>57</sup>

55 《關於援助遊擊隊戰士的呼籲——在香港國際婦女節集會上所作的演說》，載《宋慶齡選集》第一百三十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56 重慶《新華日報》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

57 《宋慶齡選集》第一百七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這些論述，反映宋慶齡的一個基本思想：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應該互相支援。

從這個思想出發，宋慶齡為「保盟」規定的工作原則是，要求援助，絕不是「乞討」；援助者也不是「憐憫」和「施捨」。「保盟」從一開始就公開宣佈：反對外國團體把在中國土地上分發援助物資當做「恩施」，或用來作為政治影響的武器。這樣，就打破了歷來救濟工作上的傳統觀念：過去，「對中國救濟」，一向是把中國人當作「施捨」的物件，或是以行善來代替政治或其他方面的活動。

有一次，香港總督在一篇表示支持「保盟」所發起的募捐運動的聲明中這樣寫道：「遭受自然和人為的侵害的不幸的受難者們以及這些無助的人的要求，都是值得大家支持的，這就是這個運動的目的。」宋慶齡接著和緩而明確地指出，人民不僅是受難者，而且是戰士。她籲請人們給予他們援助時，不要出於憐憫的心理，而要從團結他們共同進行反法西斯鬥爭的立場出發。

就這樣，宋慶齡為「保盟」及外國援華機構，灌輸了一種新的精神，把一般的救濟工作，提到國際主義的高度，使「保盟」在爭取外援時，既保持中國人民的骨氣，又與世界人民增進真誠的友誼。

「保盟」的這個原則，也反映了宋慶齡徹底平等的觀念。她不僅在國內爭階級的平等，而且在國際上爭國家與民族的平等；不管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援助國與受援國，一律平

等；反對以強凌弱，以大欺小，以富辱貧，反對任何形式的不平等現象。不用說，反對日本侵略，是這個思想的反映；在國際友好交往中，她也恪守這個原則。

世界上沒有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宋慶齡的平等思想，顯然是繼承她從小就受到的基督教平等博愛觀念、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同時也是孫中山「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遺訓的運用和發展。

宋慶齡為中國抗戰爭取外援的工作，做得很認真，很仔細。她密切注視國內外局勢的發展，根據不同的情況，發出具有針對性的呼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國法西斯大規模入侵波蘭，英國和法國對德宣戰，歐戰正式爆發，一些與「保盟」有聯繫的國際團體暫時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對此，宋慶齡在十月二十日寫了《給外國機構的一封信》，重申中國抗戰的國際意義，希望各國仍應重視對中國戰場的支援。她說，現在法西斯侵略的浪潮已經蔓延到歐洲，但是，「遠東前線仍然是反法西斯鬥爭的關鍵性的地區，而且將被證明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地區」；「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的某些國外朋友，由於這些危險日子的壓力而緊張，可能忽視了中國最迫切的需要。為了這個緣故，我們現在懇切地向你們呼籲：不要放鬆你們過去為中國所作的努力，而應當繼續並且發展這些努力」。

一九四〇年耶誕節前夕，宋慶齡發表了聖誕致詞，呼籲世界人民，特別是還未遭到法西斯戰火的國家，關心和支持在艱苦鬥爭中的中國人民。她說：「在大多數西方國家裡，耶誕節是個歡樂的時刻。這時，家家戶戶團聚在一起，互相贈送禮物。」她指出：「但是，在中國，

我們的人民已經戰鬥了三年半的時間，這個戰鬥實際上也是你們的戰鬥，並且在以後許多歲月中，這個戰鬥將繼續進行。」接著，她告訴那些還沒有遭遇戰爭的國家的人民，中國當前最大的需要是什麼：「我們北方的遊擊隊員需要的冬用毛毯、我們的傷病員所需要的藥品、我們的難民和戰爭孤兒所需要的寒衣、食品以及進行生產所需要的物資」等，提醒他們過耶誕節時不要忘記。<sup>58</sup>

必須指出，宋慶齡重視外援，並為此而嘔心瀝血，努力爭取，但是她並不依賴外援。她在爭取援助同時，一再強調中國抗戰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並且對依靠自己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充滿信心。她在抗戰初期，日本侵略軍氣勢洶洶向中國撲來，並且侵吞東部半個中國時，就莊嚴宣告：「即使中國不得不單獨與日本作戰，也不會打敗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她在向美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說，批評西方國家執行的「不干涉」政策時，擲地有聲地表示：「我敢代替全中國人民堅決地告訴你們，日本軍閥必定在我們的領土上遭遇滅亡。中國人民都準備以最後的犧牲，來保衛祖國。」<sup>59</sup>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歡迎外援又不依賴外援的錚錚鐵骨。

58 《新聞通訊》第二十四期，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

59 《申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 三、掌握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

為了不斷及時掌握變化著的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宋慶齡不僅依靠「保盟」及其各地分會收集，還派出秘書或安排觀察員到抗戰第一線視察、收集第一手材料。王安娜就是宋慶齡進行這種工作的得力助手之一。

王安娜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保盟」成立時，到了香港與宋慶齡重聚，隨即成為「保盟」最早的成員之一。起先她作《同盟簡訊》刊物的編輯工作。不久，她準備去武漢，因為武漢正受到日軍攻擊的威脅，她的丈夫王炳南正協助周恩來進行保衛武漢的工作。宋慶齡認為這是一個瞭解中國抗戰重大事件的好機會，就把王安娜作為她和「保盟」的代表派往武漢。臨行前，宋慶齡與王安娜商談多次，確定她此行的任務是，儘快地把戰爭造成的影響、傷病員和難民問題及紅十字會活動情況，報告給「保盟」。為完成這個任務，王安娜到武漢後，經常參加外國記者和陸軍武官組織的前線訪問團，以親聞實見來糾正國民黨官方新聞機關發佈的經過修飾的戰況報告。<sup>60</sup>王安娜很好地完成了這次任務。

一九三八年底，王安娜回到香港，宋慶齡又派她去上海。在上海，她向「保盟」上海分會詳細瞭解組織上技術上的各種問題。而上海分會則急於知道的是，敵後根據地最需要的救援物資是什麼，在上海已收集到的物資如何運往內地。為幫助他們提高工作效率，王安娜給

60 「聯邦德國」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一百九十八、二百〇九頁，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版。以下王安娜奉宋慶齡委派進行的活動及王安娜提供的宋慶齡在領導「保盟」時期的言行，皆引自該書，不再一一注釋。

幾個志願做這方面工作的小組，座談自己在前線的體驗和有關紅十字會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佔武漢、廣州後，對國民黨軍隊採取守勢，重點進攻華北的八路軍。華北敵後的抗日戰爭進入極其激烈、極為艱苦的時期。由於日偽及國民黨軍隊的封鎖，華北地區給「保盟」的報告很少。因此，王安娜從上海回香港後，宋慶齡就委派她為駐重慶代表，設法通過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的幫助，儘快到華北前線，把八路軍的抗戰情況、野戰醫院和得到「保盟」支持的許多計畫進行的情況，報告給宋慶齡。

在重慶，周恩來想盡辦法給王安娜收集許多關於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社會設施和文化設施資料。王安娜把這些資料譯成英文寄給宋慶齡。「保盟」的宣傳工作需要真實而生動的材料。王安娜覺得這些材料仍然不足。

由於日機轟炸和為幫助八路軍從貴陽押運一批「保盟」支援的物資，王安娜在重慶耽擱了一段日子。宋慶齡寫信給王安娜，催促她把華北的情況儘早報告給「保盟」。於是王安娜決定不顧個人安危立即前往華北前線。周恩來給她發了一張軍用通行證，並對她說：「我們任命你為八路軍少校。這樣的話，路上即使要檢查證件，查問的人對你多少也要客氣一點。這張軍用通行證對你往華北前線去也會有幫助。」

於是王安娜就從重慶北上，經成都、寶雞，到達山西太行山八路軍大本營，親眼目睹了正規軍、遊擊隊和自衛隊、兒童團等根據地軍民的火熱的戰鬥生活。然後，她由八路軍保護經過幾夜行軍，穿過日軍佔領的鐵路線，到達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會見了八路軍師長聶榮臻

和邊區政府主席宋劭文，全面視察根據地軍政設施，還依照宋慶齡的囑咐，特別詳細地考察了「保盟」援助的國際和平醫院的情況。

王安娜與白求恩大夫進行了長談。白求恩講述了他率領的醫療隊和國際和平醫院工作情況及取得的成績，提出醫院的設備和醫藥奇缺。

從華北回到重慶後，王安娜把八路軍衛生隊的廣泛活動，以及它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等詳細情況綜合起來，連同急需的醫藥用品清單一併送交「保盟」和宋慶齡處。但後來當宋慶齡想方設法把所需的醫藥用品運出時，半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的截留，以致使「白求恩大夫白等了一場」。

以後，王安娜就作為「保盟」的代表，常駐重慶。關於敵後抗日鬥爭的情況，主要靠周恩來為她提供，再譯成英文後轉送宋慶齡。皖南事變後，周恩來為抗議蔣介石的倒退行為並與中共中央商討今後的對策，返回延安。他在臨行前對王安娜表示，將盡量給她提供所需的材料。他說：「我知道你特別關心的是什麼。你每次到辦事處來，總是要求得到關於醫院、幼稚園以及關於所有由『保衛中國同盟』和外國友人所慷慨支援的事業的情況。我知道他們需要這方面的報告，但要從前線得到這種報告是不容易的。這一點，請你向他們解釋一下。」

王安娜回憶，在以後兩個夏天日機轟炸重慶的季節裡，她經常躲在重慶南部山中一座別墅裡，專心搞翻譯工作，因為周恩來「委託我把毛澤東著作中最重要的文章譯成英文」。此外，她還根據周恩來所提供的足夠的資料，定期給「保盟」和宋慶齡寫報告。

以上王安娜的敘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香港的宋慶齡是怎樣知道遠在華北敵後八路軍根據地的情況的。關於新四軍根據地軍民抗日鬥爭的情況，則由上海分會的耿麗淑、吳大琨不斷收集後經常寫報告給宋慶齡。

給宋慶齡提供情況的還有馬海德大夫。他在一九三六年隨斯諾到延安後便留了下來，積極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保盟」成立後，宋慶齡就委託他擔任「保盟」駐西北和華北抗日根據地的觀察員，定期或不定期及時、詳盡地向宋慶齡及「保盟」中央提供八路軍的醫療工作、醫院和製藥廠的情況。他曾撰寫長達二十頁的專題報告——《邊區的醫療工作》，由「保盟」中央向國外援華機構寄送。「保盟」的《新聞通訊》第二期曾刊載馬海德寫的報導《國際和平醫院》，第十期發表了由他譯成英文的關於延安魯藝的報告。白求恩犧牲後，馬海德寫了回憶錄《我認識的諾爾曼·白求恩》，刊登在《新聞通訊》十三期，同時還發表幾幅馬海德為白求恩和國際和平醫院拍攝的照片。

宋慶齡還委託其他一些在中國抗戰前線服務或來訪的國際友人提供第一手材料。在《新聞通訊》上發表的就有：美國人愛德勒·羅易寫的《在西北戰區的旅程》、約翰·福斯特寫的《與中國西北的八路軍在一起》等，以作者耳聞目睹的事實，向世界人民報導八路軍在抵抗日軍侵略鬥爭中的英勇業績。一九四〇年九月和十一月出版的《新聞通訊》第二十、二十二期，對當時八路軍在華北地區進行的一次著名大戰役——百團大戰，作了詳細報導，包括戰況、戰果及戰役指揮官彭德懷對這次戰役的評價等。

關於國際和平醫院，除王安娜和馬海德寫的報告外，還有《英國救濟工作者的北方戰區之行——參觀國際和平醫院中心》（第二十三期）、《紀念白求恩》（第二十四期）、《晉東南的醫療工作》（第二十九期）、《關於晉東南保健條件的報告》（第三十期）等。

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艾文斯·卡爾遜，是一位正義感很強，十分同情和欽佩八路軍、新四軍在艱苦條件下英勇抗戰的美國人。一九三八年，他曾通過宋慶齡、斯諾的介紹，並經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安排，到八路軍根據地考察了幾個月，與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及其他指揮官交談。然後，他又和路易·艾黎到新四軍根據地考察。他把他看到的一切及觀感在美國及國民黨統治區廣泛宣傳，表示「毫不懷疑地相信，依靠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設成功」。由於這個原因，他受到了包括美國海軍部在內的各方面的壓力。朋友也勸他「慎言」。但是，他正直勇敢，不予理睬，並向海軍陸戰隊申請退職。

中國人民十分感謝卡爾遜伸張正義的友好行為。宋慶齡把他寫的考察新四軍的報告《在長江流域的戰士當中》刊登在《新聞通訊》第二十五期上。報告記載了新四軍在華中抗日根據地既打仗又生產的動人情景，指出了新四軍地區物質條件極為困難的狀況，「迫切需要醫療品和冬衣」。

卡爾遜回國後，依然繼續發表演說和文章，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部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的遠見卓識和傑出的才華得到羅斯福總統的賞識，提升他為海軍少將，並委託他以八路軍為榜樣，訓練一支與日軍在海上進行遊擊戰爭的部隊，取得了出色的戰果。他的



事蹟後來被拍成電影，傳諸後世。日本投降後，卡爾遜任美國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主席，領導援助中國民主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支持蔣介石獨裁內戰的政策，不遺餘力，不幸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因病逝世。當時，宋慶齡曾派去唁電表示深為哀悼。<sup>61</sup>

經常給宋慶齡寫材料報告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抗戰和生產情況的，還有黎雪。他是在抗戰爆發時，由宋慶齡派到延安去的。原先宋慶齡打算把他送到蘇聯學習，李克農到上海，住在路易·艾黎家中，提出紅軍準備成立機械化部隊，很需要學工程的幹部。於是宋慶齡改變了主意，並且囑咐黎雪盡量多爭取些同學一起到延安去。黎雪後來在延安成為一位出色的領導幹部，擔任工業合作社的工程師和宣傳秘書，他把許多解放區的新聞照片，附在材料中寄給宋慶齡。這給「保盟」的宣傳工作，增添了不少色彩。<sup>62</sup>

宋慶齡還經常邀請從國內各個戰場（包括國民黨正面戰場）及抗日根據地出來的人，參加「保盟」的會議，請他們介紹情況，暢談觀感。

這樣，宋慶齡和「保盟」就能比較準確地掌握國內抗戰的全域，把支援工作做得公平合理，恰到好處。

61 《華商報》一九四七年六月七日。

62 卡毓、左夫：《宋媽媽，「大眾的兒子」向您傾訴》。

## 四、開展爭取廣泛國際援助的活動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民族解放鬥爭，深得世界各國正義人們的同情，加上由於宋慶齡和「保盟」不懈的多方面的努力和出色的宣傳工作，國際友人和廣大海外華僑加深了對中國抗戰的瞭解，廣泛地支持和援助中國的抗戰。一時間，美、英、法、加、新（紐西蘭）、印（度）等國紛紛成立各種援華團體，如美國援華會、美國醫藥援華會、大不列顛中國運動委員會、倫敦醫藥援華會、舊金山援華會、加拿大中國愛國者同盟、加拿大維利亞醫療援華委員會、加拿大維爾農中國戰災救濟委員會等，到一九四〇年二月，這樣的團體達到一百多個。其中有些團體是宋慶齡直接促成的。如美國援華會就是宋慶齡委派耿麗淑去美國發起組織的。宋慶齡十分關心這些團體的鞏固和發展，多次親自寫信給美、英援華會等團體，要求它們爭取更多的人支持和參加援華團體，積極援助中國抗戰。有些團體，對宋慶齡的呼籲，一呼即應。「保盟」成立後不久，宋慶齡寫信給舊金山的「中國人民之友社」，介紹中國各戰區難民遭受日本侵略、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亟待救濟的情況，呼籲該社喚起美國人民對中國的同情，立即引起很大反響，美國的中國救濟委員會馬上決定募集鉅款援助中國。同時，美國各地又有一百多個團體參加中國救濟委員會。宋慶齡以她的崇高威望和正義的呼聲，使這些團體博得各國各階層人士的廣泛支持。美國援華會就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母親的支持。英國援華會也得到英國工黨領袖克里普斯爵士的支持。在工作中，宋慶齡還親自出面做國際上層人士的工作。如當紐約海關不允許為「保盟」在該市舉辦義賣市場所需的藝術珍品免稅進口時，宋慶齡領

銜同香港五個婦女團體打電報給羅斯福總統夫人，要求她協助解決。很多外國大資本家，從英國的大工業家到挪威船主，都曾為支援「保盟」捐助鉅款。他們中不少人仰慕宋慶齡，「有些人就是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據上的親筆簽名而慷慨解囊的」。<sup>63</sup>儘管他們中有些人在政治上是相當保守的，但宋慶齡的名字，對他們有相當大的吸引力。為了祖國，為了人民，宋慶齡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何況只是簽個名！所以，她「曾為此而磨硬了柔軟的手指」。<sup>64</sup>

宋慶齡還十分珍視普通工人和海員的點滴捐助。

當時到「保盟」總部捐款的不少人是美國或其他國家商船上工作的海員。他們送來在駛往香港途中或在他們家鄉口岸的工會組織裡募集的幾十元或幾百元。有些人來過多次。如加拿大的太平洋輪船公司、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等，幾乎每個星期都帶些錢到保衛中國同盟辦公處來，這些錢都是從船上的海員當中募來的。<sup>65</sup>

中國有句格言：禮輕仁義重。雖然這些海員捐助的款額往往比那些富翁們捐的少得多，但是它們代表一顆顆金子般的心。從思想感情上來說，宋慶齡更感激這些工人和海員的捐贈，更珍惜與他們的友誼。有一次，她約愛潑斯坦到九龍碼頭去迎接美國朋友。愛潑斯坦遲到了，

63 廖夢醒：《我認識的宋慶齡同志》。

64 鄧穎超：《向宋慶齡同志致敬崇高的敬禮！》，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

65 參見愛潑斯坦：《我所瞭解的宋慶齡》；愛潑斯坦：《回憶保衛中國同盟的宣傳工作》，載《永遠和黨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當他趕到碼頭時，看見宋慶齡已在海員和碼頭工人中間，同他們有說有笑。愛潑斯坦抱歉地說：「沒想到你一個人來了，你自己在這裡一定感到很不安。」她微笑地回答：「周圍都是工人，怎麼能說是自己一個人呢？」<sup>66</sup>

確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宋慶齡和「保盟」的工作，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一九三九年六月，「保盟」成立一周年時，各國朋友的捐款就達港幣二十五萬元（約合當時的美元八萬元或一萬六千英鎊）。<sup>67</sup>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二月的時間裡，「保盟」又收到了港幣十六萬三千餘元的捐款。<sup>68</sup>這些捐款大多以醫療物資的形式送往內地，其中包括十輛卡車、桑尼克勞夫脫爵士捐贈的一部大型救護車、來自澳洲的數千條毯子、醫院設備包括顯微鏡和X光機、戰地臨時醫療帳篷、數千碼被單和蚊帳、縫紉機和許多其他物品，在軍隊和在瘧疾病流行區分發了十萬片奎寧。<sup>69</sup>

國際友人如此踴躍捐助物資支援中國抗戰，更加鼓舞宋慶齡和「保盟」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尤其是宋慶齡，不僅認真做好所得捐款和物資的分配工作，更加注意瞭解中國抗戰各方面急需的情況，並及時具體地向捐助者提供有關消息，以使捐助發揮最大的效果。如

66 愛潑斯坦：《我所瞭解的宋慶齡》。

67 宋慶齡《我們的第一年》，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十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68 參見《保衛中國同盟報告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第一百—一百〇三頁。

69 宋慶齡：《我們的第一年》，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十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一九三九年七月，她向國外朋友呼籲：「目前，在冬天來到之前，保衛中國同盟正在為中國的傷病員發起一次募捐二萬條毯子的運動。」因為去年在野戰醫院中「上千戰士差不多被凍死，使自願參加工作的醫生和護士們束手無策。」她呼籲，「希望制止這種慘事再現」。<sup>70</sup>

十月，她又向外國援華機構提出：「中國需要大量的防治瘧疾、霍亂、傷寒、痢疾和回歸熱的藥品，改進醫療工作的各種醫院設備、繃帶、換藥用品和急救用品。中國需要在這冬天給傷患保暖的毛毯，給傷病員和兩年戰爭中遺留下來的孤兒吃的罐頭



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經常以義演、義賣等方式為抗日前線募集資金和物資，這是一九三九年宋慶齡在香港攝於英國朋友約翰·桑勒克諾弗特捐助的大型救護車前。在保衛中國同盟的安排下，這輛車由新西蘭作家傑姆斯·勃爾特姆和德國醫生漢斯·米勒等人護送至延安。

牛奶和濃縮食品。中國需要為發展和支援這些工作的資金，而資金現在變得更加寶貴，因為外幣在和中國貨幣兌換時變得更有利。」<sup>71</sup>

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在那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給予無私援助的國際友人。正如宋慶齡在抗戰勝利時所表示的：「感謝我們的堅定不移的、同情我們事業的朋友們，尤其是那些從物質上和精神上支援我們的人民及前線和後方戰士的朋友們，幫助我們的人民把苦日子熬過來。這些支持提醒了中國人民，他們不是孤立的，並且使他們振作起來。」她強調：「這種支援對保衛中國的作用，不亞於以飛機、坦克和槍支的支援。」<sup>72</sup>

## 五、動員海外華僑援助祖國抗戰

宋慶齡十分重視海外華僑的工作。華僑是祖國的赤子，他們身在異邦，心懷故鄉，對祖國的興衰感受至深，渴望祖國獨立和富強。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時，就曾得到華僑的大力支持。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後，廣大華僑為了抗戰救國，更表現出高度的愛國熱情。由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司徒美堂領導的「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等各種華僑救亡團體紛紛成立；華僑救亡籌賑運動在許多地方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宋慶齡從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實踐中，深深敬佩華僑的愛國傳統，因此一直與他們保持著

71 《給外國機構的一封信》，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十四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72 《保衛中國同盟聲明》，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四十八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廣泛的聯繫。

中國抗戰爆發後，宋慶齡立即從各方面著手發動華僑參加抗戰事業的工作，與司徒美堂、陳嘉庚等各地華僑領導人取得聯絡。在她的推動下，一九三七年底，駐粵各華僑團體發起成立「華僑抗敵總會」，推選宋慶齡為名譽主席。

宋慶齡在建立「保盟」後，為適應港澳同胞和華僑抗日的需要，特地撥款派廖承志及其表哥、「保盟」的司庫鄧文釗出面，幫助創辦愛國的中文晚報《華商報》（由范長江任社長、胡仲持為總編輯）。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華商報》正式創刊，宋慶齡為該報題詞：

為堅持抗戰作有力之後盾，為保持團結作有效之喉舌，為實現民主作正義之呼籲，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訴，給予侵略者以嚴重之打擊。

何香凝的題詞是：「團結抗戰，抗戰必勝；真誠合作，建國必成。」

宋慶齡還多次為《華商報》撰稿，並團結許多重要人物支持該報，使該報在僑胞中享有很大的威望，為團結僑胞、堅持進步與抗戰做出重大的貢獻。

一九三八年九月，華僑抗敵總會在香港召開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宋慶齡親自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並出席大會發表題為《華僑總動員》的著名演說，進一步發動華僑積極投入救國運動。

在演說中，宋慶齡對如何進一步開展華僑救國運動，提出了寶貴的意見，認為：「保證華僑能夠動員，最重要迫切的是加緊華僑中的團結，充實與擴大華僑救國的組織，統一華僑運動的領導，以及發揚應有的民主精神。」為此，她指出要克服華僑中一部分人的地域幫派的觀念，以使僑胞「不分地域，不分畛界，親誠合作」。

演說還批評了政府在接待華僑工作上的缺點，指出：「一年以來，先後回國服務，請纓殺敵者，時有所聞。但惜我政府對回國服務僑胞，未能妥予招待，親切接洽，予以指導，致使久離祖國之僑胞，深感人地生疏之苦，請纓無由，進退兩難，徬徨歧路，有挫華僑之壯志熱忱。深望我政府今後對回國服務之僑胞，對國內華僑團體，予以親切的扶植，給以工作的機會。對海外僑胞、救國團體，應加強聯絡，經常給以政治上精神上的幫助，盡量為華僑解除痛苦與困難，更多為華僑謀福利。」

這些意見，同時也為「保盟」接待華僑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宋慶齡領導「保盟」團結僑領、僑商，鼓勵他們踴躍輸捐，支援抗戰，做了大量工作。



延安洛杉磯托兒所的工作人員及孩子們。這所保育院是用保衛中國同盟向美國洛杉磯的華僑募捐的經費建立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她代表「保盟」親筆寫信給陳其瓊、趙建生，對「僑美同胞為祖國努力，屢次匯款援助抗戰將士」表示欽佩和感謝，勉勵僑胞「繼續努力，經常賜助，務求早日獲得光榮勝利」。<sup>73</sup>

在宋慶齡的號召和推動下，華僑救國運動出現了更加壯闊的形勢。在歐美，在新加坡、菲律賓、南洋、越南、緬甸、印度、印尼等地的華僑，積極組織救國團體，進行抵制日貨，擴大國際宣傳，籌募捐款，成立戰時服務團體，回國直接參加抗戰，給抗戰以極大支援。據不完全统计，從「七七」事變到一九四一年初，各地華僑的抗戰捐款達二十六億元。<sup>74</sup>廣大華僑工人更是節衣縮食，省下血汗錢來支援祖國抗戰。當時華僑支援祖國抗戰，真正做到了富商巨賈，不吝金錢；勞工平民，盡傾血汗；甚至出現毀家紓難，捨身救國的動人事蹟。這些捐款，一部分直接匯給宋慶齡，有的由華僑海員交到「保盟」總部。延安的「洛杉磯保育院」就是由宋慶齡向美國洛杉磯華僑募捐的款項創辦的。抗戰初期，「保盟」每年秋天都要開展徵募寒衣運動，海外華僑無不積極回應。如一九三九年，「南僑總會」接到電文後，僅月餘就募得寒衣三十萬套。至於國內急需的大宗藥品，如新四軍提出的奎寧丸，產於爪哇，市場緊缺，「南僑總會」便從荷印各慈善機構四十餘處購得五千萬丸寄贈祖國。

許多華僑青年不顧困難，不怕犧牲，毅然歸國參加抗戰，有的奔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

73 《宋慶齡致陳其瓊、趙建生函》（影印件），藏北京宋慶齡故居。

74 延安《解放日報》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

大學、陝北公學、女子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學校短期訓練後就奔赴抗日戰場。有的直接參加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等抗日隊伍，不少人為保衛祖國英勇捐軀，血灑疆場。還有許多華僑青年司機駕駛著華僑捐助的救護車回到祖國，直接開到抗日前線。

## 六、在香港和國內開展募捐活動

宋慶齡在領導「保盟」積極爭取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援助中國抗戰的同時，也不失時機地在香港和國內開展活動，團結國內同胞實行全民抗戰，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宋慶齡清楚地知道，「統一戰線和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是繼續和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的唯一保證」。<sup>75</sup>因此，她以這個精神領導「保盟」；以堅定的原則性和高度的靈活性相結合的鬥爭藝術，在「保盟」工作中開展廣泛的統戰工作，為鞏固和擴大國際國內的統一戰線，支持抗戰到底，做出了重大貢獻。

早在抗戰爆發後，宋慶齡以政治家的偉大氣魄團結在政治上長期分道揚鑣的親屬，如宋子文、宋藹齡、宋美齡、孫科等人，同他們一起發起抗日組織，參加抗日活動。「婦慰分會」的成立則是三姐妹合作的開始。當宋慶齡多次向美國發表廣播講話，批評美英等同對中日戰爭持「中立」政策，呼籲支援中國抗戰時，宋美齡、宋子文也對美國發表了同樣內容的廣播

75 宋慶齡：《救濟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二十六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演說。然後，她又以民族大義為重，拋嫌釋怨，團結宋子文、孫科共同發起成立「保盟」，並努力爭取宋藹齡、宋美齡對「保盟」工作的支持。

一九四〇年三月，宋美齡到香港治病，宋藹齡則早在武漢失守後到了香港。三姐妹經過十年中斷聯繫後的第一次團聚，成為抗戰中的一段佳話，廣泛被人們傳頌。三月十二日，三姐妹一起出席香港各愛國團體舉行的一次集會，並分別在會上講了話。在講話中，宋美齡高度讚揚宋慶齡通過「保盟」和「工合」對中國戰時救濟工作所做的貢獻；宋慶齡和宋藹齡則呼籲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宋美齡主持的「傷兵之友運動」。此外，她們還先後參加香港地區的各種有關會議。鑒於宋藹齡一直沒有擔任公職，宋慶齡在一次婦女會議上提議宋藹齡擔任香港傷兵之友協會主席，她說：「沒人比她更合適這個職務了。」<sup>76</sup>三姐妹經常一起發起或互相配合進行一些重要的募捐活動。在從事難民和傷兵的慰勞、救護工作方面，她們的合作尤為突出。宋慶齡還擔任了重慶傷兵之友總社的理事，積極地進行募集資金及救護物質。可以說，除童年時代外，抗戰時期是三姐妹一生中關係最密切的時期。

宋美齡支持宋慶齡領導的「保盟」，宋慶齡支持宋美齡領導的「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委員會」及以繼「保盟」後成立的「中國婦女指導委員會」（簡稱「婦指會」）。「婦指會」是全國各婦女團體在廬山會議上組成的統一的婦女組織。宋美齡、鄧穎超、史良、沈茲九、

劉清揚、勞君展等參加了這次會議。宋慶齡雖未參加會議，但她是會議的宣導和組織者；會後，鄧穎超又立即赴香港向她彙報了會議的情況。

「婦指會」的工作不僅包括援助孤兒和受傷的軍民，並且開展文娛活動進行慰勞前線官兵、教育農村婦女、出版雜誌、恢復和改良手工業方法以發展地方生產，以及訓練所有婦女工作的幹部和組織人員等方面。宋慶齡始終關懷這個統一戰線的婦女組織，不僅參與領導，並熱情地支持它的工作。她後來稱讚說：「這個委員會發展得很迅速，因為它一開始就是一個真正的統一戰線組織。國民黨、共產黨和無黨派的婦女站在平等的地位，參加會議討論。」<sup>77</sup>儘管後來由於國民黨右翼勢力的活動，「婦指會」的工作中充滿鬥爭，但由於宋慶齡和鄧穎超在這個委員會中的威信和影響，一直維持著該組織的團結，使它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抗戰期間在重慶。右起：宋慶齡、宋美齡、宋藹齡。

77 宋慶齡：《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鬥爭》，載《宋慶齡選集》第一百六十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組織偽政府，中國「分裂」之事成為人們議論的中心，廣大人民為此憂慮，日本帝國主義則十分得意。為著打擊敵人和消除影響，三姐妹於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即汪精衛在南京袍笏登場的次日），連袂赴渝，訪問大後方，以示團結禦侮、共同抗敵。這成了當時轟動國內外的一大新聞。

是日，宋氏三姐妹在香港機場雖然是秘密起飛，但到達重慶時卻受到公開而熱烈的歡迎。

三姐妹走遍了這座戰時的陪都重慶，視察訪問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重慶第一兒童保育院，到傷兵之友醫院等地慰問傷病員。她們還會見各界民眾，多次發表演講，號召人們加強團結、堅持抗戰、反對漢奸賣國賊。

由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在國統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特地發表《歡迎孫夫人來渝》的短評，指出：「當前抗戰進入巨艱階段，反汪除奸和憲政



宋慶齡與宋藹齡、宋美齡在重慶第五陸軍醫院慰問傷病員。



在重慶視察防空洞。右起宋慶齡、宋美齡、宋藹齡。

運動正在逐漸展開，而更需要加強人民抗日的力量，首先是舉國一致的精誠團結，更需要團結婦女界，組織廣大婦女群眾到抗戰中間來的時候，孫夫人的來渝，定能在這些方面，有極大的寶貴的貢獻。」<sup>78</sup>表明了共產黨對宋慶齡來渝所寄予的希望。

宋慶齡沒有辜負中國共產黨的期望。在四月七日宋美齡邀請重慶婦女界歡迎宋慶齡和宋藹齡的招待會上，宋慶齡在答謝詞中希望全國姐妹們更加努力，多注意婦女的教育工作，指出：「我們不要做表面的文章，我們需要做實際的工作……做堅持抗戰的工作。」她還講述了婦女參加國民大會以及政治民主化與婦女解放的關係等問題，並為各界婦女寫了「抗戰到底」的題詞。<sup>79</sup>

四月十八日，三姐妹到重慶中央廣播台播音室，發表對美國的廣播演講，並由美國廣播電臺轉播全美。

78 《新華日報》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

79 《新華日報》一九四〇年四月八日。



宋慶齡在重慶慰勞抗日將士。

宋慶齡首先用流利的英語慷慨激昂地說：「日本借著它擁有優越的武器，在開戰以前，曾經向世界誇口說：要使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於三個月內，向日本屈服。可是我們中國，始終不屈地作有效的抵抗，現在已有三十三個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繼續抗戰的決心，自信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太平洋和全世界人民的將來歷史，一定和以前不同，且將再見光明燦爛，因為中國不願做奴隸的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已經拿起了武器，爭取自己的自由，同時也是為世界人類，為你們大家爭取自由。」<sup>80</sup>

四月下旬，三姐妹走訪了成都。二十五日，她們視察了成都工業合作社，在工人舉行的歡迎會上，宋慶齡雖患牙病，仍講話強調「工合」事業對實行孫中山「民生主義」及改善人民生活的意義。二十七日，宋慶齡和宋藹齡出席宋美齡在勵志社舉行的歡迎茶會。應邀出席茶會的各國婦女代表四百餘人，宋慶齡在會上再次闡述婦女參加國民大會及憲政運動的重要性。她強調指出：婦女界應該著重教育工作，「將來國民大會，不日召集，應使婦女界明瞭其重要性，由各團體推出代表參加憲政運動，動員廣大婦女，努力於此」。<sup>81</sup>

總之，三姐妹在四川期間多次發表的講話中，宋慶齡明顯表現不同於兩姐妹的思想和言論，她始終如《新華日報》短評中希望的那樣，強調「工合」運動及婦女運動的政治意義，宣傳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政治民主化——當時中共及民主黨派推動的旨在削弱國民黨一黨

80 重慶《新華日報》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九日。

81 同上報，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

專政、蔣介石一人獨裁的「憲政運動」。

在四川之行達到目的後，宋慶齡就於五月九日返回香港。行前，蔣介石及宋美齡、宋藹齡都希望宋慶齡「長住重慶領導婦女工作，輔助國民黨政府」，但是宋慶齡認為重慶「並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著我」。<sup>82</sup>在「保盟」的中心基地香港，宋慶齡在那裡開展的募捐活動最為出色。她特別注意首先做好香港當局的工作，曾多次會見香港總督和各國來港的政要富商。在她的感召下，香港總督羅國富積極支持和參加「保盟」發起的為支援「合」、募集救濟基金所開展的「一碗飯運動」。另一位總督楊慕琦，也親自為「保盟」主辦過一次籌募基金的活動。香港主教羅倫德·O·霍爾，更是積極熱心地支持「保盟」的活動。

「保盟」在香港先後舉行過一系列電影、戲劇、音樂、舞蹈義演和義賣花卉等活動。由於都是以宋慶齡的名義為號召，這些活動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獲得很大的效果，其中戴愛蓮的舞蹈給人的印象深刻。戴愛蓮由倫敦回國路過香港，應宋慶齡的邀請進行義演。戴愛蓮演出了直接表現抗日前線生活的《東江》《奮起》等節目，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和宋慶齡的好評。規模最大的募捐活動，是一九四一年宋慶齡主持的「一碗飯運動」。

「一碗飯運動」是美國醫藥援華會於一九三九年首倡的。它每年舉行一次，在美國人民和華僑中籌措捐款，以購買藥物和醫療設備，支援中國抗戰。英國倫敦也曾經舉行過。宋慶齡領導「保盟」



為在香港地區舉行這一活動，進行了認真而深入的發動和組織工作，由她任「一碗飯運動」委員會的名譽主席，香港立法局華人首席議員羅文錦為主席，克拉克夫人為副主席。募捐的方式是：由委員會發售餐券一萬張，每張二元，持券者可到指定的餐室吃一碗炒飯，由參加贊助的飯店、酒家、茶室提供餐品。整個活動的收入將捐贈給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作為救濟基金。「一碗飯運動」的消息傳出後，香港各界熱烈響應，短短的幾天中，就有十三家飯店認捐五千餘碗飯之多。

宋慶齡十分興奮，她於七月一日晚在英京酒家舉行規模盛大的「一碗飯運動」成立典禮。出席中外人士一百五十餘人，其中有英軍駐華陸軍總司令賈乃錫、海軍司令哥連臣、輔政司史美夫人、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立法局葡籍議員少廖亞厘協打、中國「工合」技術顧問路易·艾黎、工商界人士周壽臣、林培生、中國紅十字會主席林可勝和香港華商總會主席郭泉等。英京酒家門前車水馬龍，冠蓋雲集，在四周馬路上圍觀的群眾數以千計，人人爭相一睹宋慶齡的風采。宋慶齡在典禮上發表講演，說明「一碗飯運動」的意義，指出「這次捐款是要說明工業合作社去組織及救濟難民傷兵，這是鞏固經濟陣線，是生產救國，是幫助人們去幫助自己，是最妥當的一種救濟事業」。<sup>83</sup>

香港總督羅國富爵士向宋慶齡和克拉克夫人送來了賀信，由羅文錦律師在大會上宣讀。當時英國倫敦也在慘遭德國法西斯的轟炸，賀信中表示與宋慶齡一貫堅持的相同的觀點，指

出在「侵略主義」下，「吾儕兩國人民，慘遭轟炸，同處水深火熱之中」，並感謝香港人民「對於不列顛之浩劫，曾作慷慨之捐輸」。<sup>84</sup>

晚會的大廳主席桌上，陳列著宋慶齡捐贈的孫中山生前一些珍愛的墨寶和其他文物紀念品，當場義賣作為捐獻，引起在場的銀行界和工商界頭面人物的爭購。這些珍品很快都被爭購一空。<sup>85</sup>

八月一日，「一碗飯運動」在香港的英京、樂仙等十三家酒店餐館正式舉行。是日的《華商報》刊出宋慶齡所作的親筆題詞：「日寇<sup>86</sup>所至，骨肉流離，凡我同胞，其速互助。」香港各界民眾紛紛購買飯券，以能夠為資助中國「工合」救濟祖國同胞而購吃「救國飯」為榮。

「一碗飯運動」盛況空前，一再延期，至九月一日方舉行結束典禮。在宋慶齡主持的結束典禮上，該委員會公布此次運動的純收入為港幣二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元九毫半、國幣六百一十五元。英國賑華會香港分會即將捐助款湊足整數，即港幣二萬五千元整。

「一碗飯運動」，生動地體現宋慶齡實踐全民抗戰路線的精神。這對執行片面抗戰路線的國民黨政府來說，是根本做不到的；對不具備宋慶齡及其領導的「保盟」這樣特殊條件的任何個人或團體，也是難以做到的。

84 《華商報》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

85 徐舜英：《我們時代的一顆巨星——憶宋慶齡居留港渝時》，載《宋慶齡紀念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86 「寇」字，當時未能通過當局的檢查，刊出時以「X」代之。